

目 录

总序.....	v
前言.....	viii
第一章 “国家语言能力”再解读.....	1
1.1 研究回顾.....	1
1.2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	5
1.3 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	8
1.4 结语.....	9
第二章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简史（1949年前）.....	10
2.1 通用语推广.....	11
2.2 汉字规范化.....	13
2.3 历史特征.....	15
2.4 深远影响.....	18
2.5 结语.....	19
第三章 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70年建设的发展历程.....	21
3.1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	21
3.2 国家语言核心能力.....	25
3.3 国家语言战略能力.....	27
3.4 结语.....	29

第四章 新中国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	31
4.1 机构体系构建	32
4.1.1 国家通用语事务.....	32
4.1.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事务.....	36
4.2 规划制定与实施	38
4.2.1 国家语委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	38
4.2.2 国家民委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	40
4.3 研究与交流	41
4.3.1 语言生活研究.....	42
4.3.2 科研成果交流.....	43
4.4 结语	44
4.4.1 彻底解决地县两级机构落实不力问题.....	45
4.4.2 增进国家语委和国家民委之间的协同.....	45
4.4.3 加强国家对涉外语言事务的治理能力.....	46
4.4.4 积极组织对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研究.....	46
第五章 新中国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	48
5.1 国家通用语普及	48
5.1.1 取得的成就.....	49
5.1.2 面临的挑战.....	56
5.1.3 对策与思考.....	58
5.1.4 小结.....	60
5.2 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	61
5.2.1 政策力.....	61
5.2.2 实践力.....	68
5.2.3 绩效力.....	70
5.2.4 未来发展路径.....	71
5.2.5 小结.....	73

5.3	国家语言智能化	74
5.3.1	发展历程	75
5.3.2	基本经验	80
5.3.3	未来展望	82
5.3.4	小结	85
5.4	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	86
5.4.1	语言文字定位与功能规划	87
5.4.2	语言文字规范与发展规划	92
5.4.3	挑战与思考	96
5.4.4	小结	99
5.5	结语	99
 第六章 新中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		101
6.1	国家外语教育	101
6.1.1	新中国外语教育发展阶段性特点	102
6.1.2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109
6.1.3	小结	112
6.2	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	112
6.2.1	发展现状	113
6.2.2	存在的问题	118
6.2.3	对策与建议	120
6.2.4	小结	122
6.3	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	123
6.3.1	外语人才资源掌控能力建设背景	123
6.3.2	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的建设	126
6.3.3	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能力建设展望	130
6.3.4	小结	132
6.4	国家对外话语表述	133
6.4.1	核心内涵	133

6.4.2	表述风格	136
6.4.3	表述机制	138
6.4.4	未来发展路径	140
6.4.5	小结	144
6.5	结语	145
第七章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助推两个共同体建设		147
7.1	国家语言核心能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48
7.2	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150
7.3	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语言能力发展刍议	152
7.3.1	以促进更高水平的普惠发展为目标	152
7.3.2	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多元互通为基础	153
7.3.3	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支撑	155
7.4	结语	156
后记		157
参考文献		163

总序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是201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是国家语委首批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背景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能力不相匹配。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也是硬实力的支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军事实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军事能力展现的是使用“硬武器”的成效，国家语言能力展现的是使用“软武器”的成效。国家层面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作为保障。

2016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写道：“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强盛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会自动地促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强国可助强语，强语可助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定能强语。在目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加强领导，社会组织和学者群体高度关注，以形成共识，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使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让国家语言

能力助推综合国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本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本课题组自获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以来，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本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即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个分项能力又各涵盖3—4个维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国家语言核心能力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智能化与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和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可以看出，三个分项能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 and 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人和张天伟教授、杨佳博士后、董希骁教授、詹霞副教授、戴冬梅教授、李迎迎教授、邵颖副教授、张佳琛博士、董丹博士、汪波副教授等人共同努力，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依据，融合中外视角，对中国、罗马尼亚、德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语言能力开展了个案式的深入调查分析。《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团队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全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同时也审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梳理了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史，并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为探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除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第二批著作《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荷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韩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双向互动比较的内外视角，探究中国和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体系的异同，由此借鉴外国经验，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世界语言文字强国。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5月1日，劳动节

前 言

“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2011年经文秋芳引进后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在学术界的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其联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重要纲领性文件中也都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列为现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于2018年承担了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在项目首席专家文秋芳的带领下，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不单单是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的行政事务，同时还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基建”工程。有鉴于此，我们撰写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一书，期待让更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及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增进对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理解与支持。

本书共七章，以文秋芳2019年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基础，对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程及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第二章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程进行了简单回顾；第三章以举例方式简要介绍了新

中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第四至六章逐一考察了国家语言能力三类分项能力——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建设情况；第七章主要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并根据中国国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相关建议。

短短 70 余年时间，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现阶段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仍面临不少挑战，与我国综合国力还不匹配。我们希望借此书的出版与众多语言文字工作者携手共进，为推动国家语言能力的继续发展尽绵薄之力。受时间和精力限制，书中疏忽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学界同仁与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文秋芳 杨佳

2020 年 10 月 5 日



第一章

“国家语言能力”再解读¹

强国必强语，强语助强国（杜占元 2017）。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背景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尤为重要。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已取得一些开创性成绩，但在理论深度和彰显中国特色方面尚有不足。为此，2018 年国家语委将“‘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期待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带领团队有幸承担这一项目，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本章拟简要回顾前期研究，总结其优势及局限，说明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1 研究回顾

1993 年，美国学者 Brecht & Walton 率先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特定语言

¹ 本章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参见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 70 年的建设与发展》，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需求的能力” (Brecht & Walton 1993), 这实际上指国家外语能力。随后一些美国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Brecht & Rivers 1999, 2005, 2012; Jackson & Malone 2009; Murphy & Evans-Romaine 2016), 但这些研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2011年, 这一概念被引进中国 (文秋芳 2011a), 随后一些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 (李宇明 2011; 赵世举 2015; 魏晖 2015; 黄德宽 2016; 陆俭明 2016; 周庆生 2016; 文秋芳 2016a, 2017)。表 1.1 总结并评述了部分研究的主要观点。

表 1.1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观点及评述

作者	定义	分项能力	评述
李宇明 (2011)	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 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	(1) 语种能力; (2)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 (3) 公民语言能力; (4) 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 (5) 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定义沿用美国学者的思路, 内容较全面, 但分项能力中未区分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语言能力, 各分项能力之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 命名缺乏统一性, 有的用“能力”, 有的用“地位”“水平”。
赵世举 (2015)	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	(1) 语言资源拥有能力; (2) 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 (3) 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4) 国民语言能力; (5) 语言人才储备能力; (6) 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 (7) 语言影响力。	定义沿用美国学者的思路, 内容较为全面, 但概括性、系统性不够; 分项能力命名具有统一性, 但将国民语言能力纳入国家语言能力不够妥当。
魏晖 (2015)	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 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 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 (2) 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 (3) 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 (4) 翻译能力 (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 (5) 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 (6) 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 (7) 语言信息处理能力; (8) 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	定义突出管理效率, 视角新颖, 但不完全适合分析国家语言能力, 因为这是社会公共产品而非纯市场化产物; 分项能力比较全面, 符合中国国情, 但缺乏内在逻辑结构。
文秋芳 (2016a)	政府处理海内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	(1) 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 (简称管理能力); (2) 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 (简称掌控能力); (3) 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 (简称创造能力); (4) 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 (简称开发能力); (5) 对通用语言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 (简称拓展能力)。	定义仅限于战略层面, 过于狭窄; 分项能力仅适合分析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实践, 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以上各位学者的定义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差异。李宇明、赵世举和文秋芳基本沿用了美国学者的思路，明确指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和应用范围，清晰说明了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一种；差异在于，李宇明和赵世举的定义应用范围比较宽泛，而文秋芳的定义则重点强调战略层面的应用。依据杨亦鸣（2015）的观点，李宇明和赵世举的定义属于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宽泛解释，包括公民（国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文秋芳的定义则属于狭义解释，仅指国家在战略层面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时所需的语言能力。魏晖的定义以行政管理学为出发点，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分配、管理和利用语言资源的效率，理论视角新颖，但似乎不适于讨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社会公共产品。

从分项能力来看，各定义的相似度很高。文秋芳（2016a）列出的五类分项能力基本覆盖了其他学者阐述的内容（见图 1.1），但有两点未涵盖：一是公民语言能力或国民语言能力，她认为这不属于国家语言能力范畴；二是魏晖提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她当时认为这似乎与国家战略利益无关，但事实上，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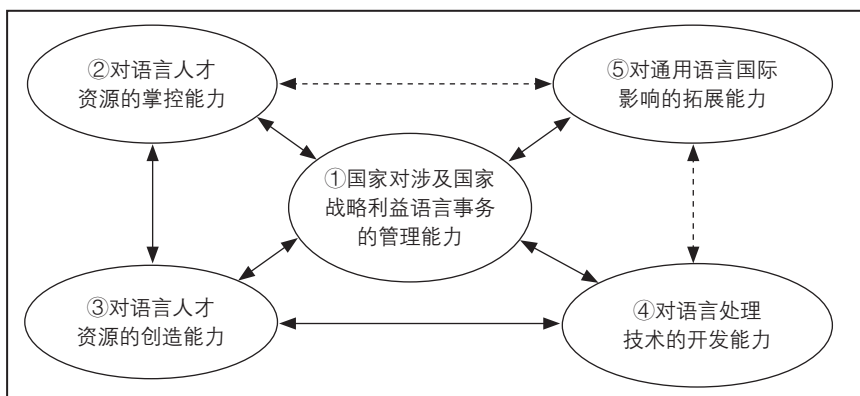


图 1.1 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及其关系

文秋芳（2016a）还就五类分项能力提出了评价指标（见表 1.2）。这是学界对国家语言能力认识的第一阶段。

表 1.2 国家语言能力分项能力的评价指标

	分项能力	评价指标	说明
1	管理能力	组织力	管理机构的布局及其任务的合理性
		规划力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以及制定应对方案的计划性
		执行力	落实规划的速度和效率
		应急力	处理海内外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2	掌控能力	通晓力	对国家拥有语言资源的种类和质量的熟悉程度
		支配力	调用语言资源服务国家需求的速度和准确性
3	创造能力	实践力	培养国家短缺语言人才计划的落实能力
		科学力	培养国家短缺语言人才的有效性
4	开发能力	信息挖掘力	挖掘公开（开源）情报的自动化程度与准确性
		机器翻译力	运用机器翻译语言的速度和质量
5	拓展能力	影响力	国家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使用的广度和深度
		传播力	国家通用语言创造或推广新知识的能力

在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第二阶段，文秋芳依据 Saussure（1959）的 *langue/parole* 和 Chomsky（1965）的 *competence/performance* 的观点，将其划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前者类似于 *langue* 或 *competence*，后者相当于 *parole* 或 *performance*（文秋芳 2017）。国家话语能力是对国家语言资源能力的运用，缺少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就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只能观赏，而无实用价值。图 1.2 展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双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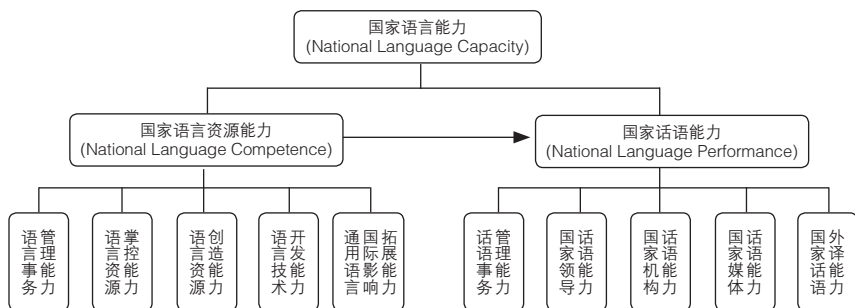


图 1.2 国家语言能力的双层结构（参考文秋芳 2016a：27，2017：69）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学者已经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及其解读做了不少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初创性，但其局限性仍非常明显。第一，未将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整合在统一框架内；第二，缺少双向研究思路，仅由外向内看，即以其他国家的实践为标杆审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缺少由内向外看的视角，即以中国实践为出发点，审视其他国家的情况，考察中国自身的优势，展现已取得的辉煌成绩。本书将融合内外视角，把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整合到同一个体系内，重新解读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和分项能力，调整文秋芳（2016a，2017）前期提出的理论框架及其评价指标，使其更具概括性和普遍性。

1.2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

鉴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宗旨与路径与美国不完全相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就不能完全遵从美国学者的思路和美国国防部的实践。根据中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实践，我们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重新解释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这里需要指出，处理语言事务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或非官方团体；处理的事务必须涉及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职业规划或不涉及国家利益的群体行为；处理这些事务必须以语言为手段，而不是用军事或其他非语言手段。借鉴文秋芳

对国家语言能力分项能力的界定（文秋芳 2016a, 2017），本书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新框架。如图 1.3 所示，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部分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和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故用双向箭头连接，表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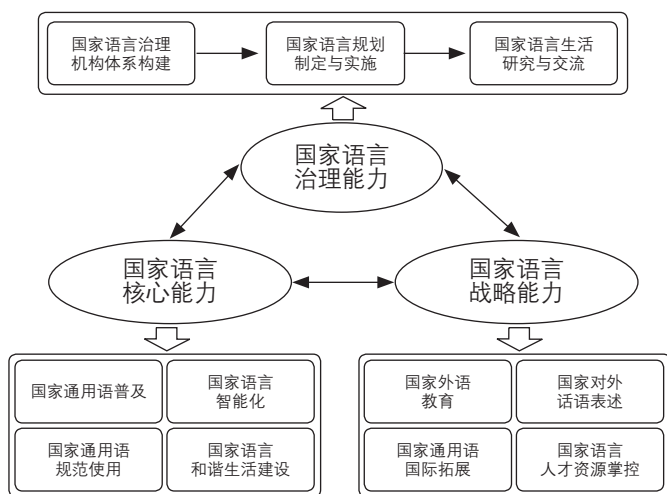


图 1.3 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新框架

表 1.3 列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类分项能力所涵盖的不同维度及其意义解释。每类分项能力涵盖 3—4 个维度，每一维度再分为若干方面。需



要说明的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类分项能力相对稳定，但每类分项能力所涵盖的维度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也就是说，随着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和发展，每类分项能力所涵盖的维度会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表 1.3 国家语言能力三类分项能力涵盖的维度及解释

类型	各维度名称	解释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	国家语言治理机构体系构建	政府能否有效构建国家语言治理的行政体系
	国家语言规划制定与实施	政府对国家语言事务治理是否有系统的计划和落实措施
	国家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	政府语言治理机构是否能组织对社会语言生活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展国内外交流
国家语言核心能力	国家通用语普及	政府能否依法依规有效普及国家通用语
	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	政府对通用语的使用是否采取了系列规范措施
	国家语言智能化	政府能否有效运用智能化技术输入和处理不同语言，从而满足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智慧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	政府能否恰当处理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方言之间的关系，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构建语言生活的和谐社会环境
国家语言战略能力	国家外语教育	政府能否培养出外语语种数量多且质量高的国际化人才，以满足国家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需求
	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	政府能否在国际上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的地位并达到预期效果
	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	政府能否掌控并有效使用国家的各种语言人才资源
	国家对外话语表述	政府能否在国际场合有效表述国家话语并恰当译成所需的外语语种

与文秋芳前期建构的理论框架（见图 1.1）相比，这个新框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根据内在逻辑关系，新框架首先确立了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类分项能力及其关系，然后再分析各分项能力所涵盖的不同维度；第二，新框架中的三类分项能力涵盖的维度更丰富、更全面，也更开放，能够充分解释中美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和发展实践。

1.3 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

不少人会将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人语言能力混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人语言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语言能力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处理的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事务，例如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等。推动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依靠的是政府力量，其中包括政府制定规划、下拨特定款项、落实专门措施等。以缅甸语为例。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缅甸建交，北京大学于1949年开设缅甸语专业（这也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外语专业之一），每三年或四年招收一届本科生。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缅甸语人才不可或缺，但站在个人角度，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学习使用范围极其有限的缅甸语，将其作为谋生的本领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国家需要建立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制定特殊政策，加大经费投入。如果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缺乏规划力和行动力，就很难吸引高中毕业生报考小语种专业。

个人语言能力指个人的语言水平，代表个人语言水平的可以是各种语言考试的成绩，或者是各种语言比赛的名次。个人语言能力是公民的文化资本，对个人的就业、职位晋升、事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个人语言能力的提高通常有多种动力源，其中主要有：（1）政府政策，如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积极推进小学开设外语课和增加高考外语语种的通知；（2）家长意愿，如相当多家长心甘情愿花钱把小孩送进周末或暑期外语班学习，认为提前投资外语学习，可以让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前途；（3）市场推动，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类似新东方的外语培训机构大批涌现，吸引了大量业余外语学习者。

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人语言能力存在密切联系。国家语言能力涵盖了若干个人语言能力，但个人语言能力水平不能代表国家语言能力水平。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英语平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能用英语从事贸易、文化、科技交流的人数快速增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国家语言能



力的强大。截至 2019 年 9 月，我国已与 180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需要拥有精通这 180 个国家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外交人员。截至 2016 年，全国高校共开设了 66 种非通用语专业，专业点 391 个，分布在 167 所高校（丁超 2017）。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已基本开齐与中国建交国家的主要官方用语专业，2019 年获批开设外语语种数量达到了 101 种（文秋芳 2019c）。

1.4 结语

我们融合“从外国看中国”和“从中国看外国”的内外视角，同时把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整合在同一框架内，将国家语言能力重新定义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这里强调执行国家语言能力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或任何非官方团体；处理语言事务的范围，既有国内又有海外；相关事务须涉及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些群体利益；处理这些事务必须以语言为手段，而不是用军事或其他非语言手段。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类能力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稳定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处于顶端，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调控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走向；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处于优先发展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需从长计议，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规划和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人语言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直接服务于国家需求，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个人语言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